

目 录

导论：未曾停止的自然之思	1
第一编 自然诗歌的前身——田园诗歌	15
第一章 殖民政治中的环境与社会之伤：	
斯宾塞诗歌中的时间与农事元素解读	26
第二章 田园劳动之“耕作的良心”：	
马维尔笔下割草人形象中的农事理想	51
第二编 自然诗歌的兴起与发展	69
第三章 被毒害的自然与身体：	
《麦布女王》中的身体意识与生态理想	82
第四章 自然的信仰与信仰的科学：	
霍普金斯风景诗中的神性自然	98
第五章 危机中的自然与城市：	
《荒原》戏仿田园中的现代性批判	117
第六章 现代主义话语中的自然与自我：	
以《勃力格低地》中的环境意识为重点	130
第三编 自然诗歌的当代蜕变——生态诗歌	143
第七章 神圣劳动与自然治愈之合：	
希尼家务农事诗中的女性形象	155
第八章 环境滤镜下的地方与他方：	
阿米蒂奇诗歌中的北方故乡	172
第九章 气候危机与气候伦理：	
《向盖亚致敬》中的伦理思考	185

第十章 当代风景与反风景：	
激进派风景诗中后现代风景的生态意蕴	198
余论：来自人类世的伦理反思.....	217
参考文献.....	225

导论：|

未曾停止的自然之思 |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人们深深地困惑于不断刷新纪录的极端天气，世界范围内频发的海啸、飓风、洪水、山火等自然灾害，以及人类破坏活动所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的时候，科学家们开始用“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一词重新定义人类与其身处的这个蓝色星球之间的关系¹，诗人们则以饱含忧患意识的生态诗歌(ecopoetry)或可持续诗歌(sustainable poetry)来重申诗人的社会责任。相比之下，那些讴歌美好自然、被当代人斥为“只有活在旧日时光里的老人家才乐意聆听的老套的陈词滥调”的自然诗歌是否真的已经严重脱离了我们的时代？(Astley: 15)而那些试图在虚幻的阿卡迪亚中寻求慰藉的田园诗歌是否应该被弃如敝屣？

事实上，生态问题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我们的先民早在几千年前便已形成有关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和“万物一齐”等观念包含着古老的生态智慧，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中也孕育着现代生态意识的幼苗。因此，不仅自然诗歌里有值得发掘的生态思想宝藏，传统田园诗歌中也不乏诗人们对自然的现实主义认知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挖掘传统思想的宝藏，寻找当代生态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源头，这个过程好似一次在时间之河中逆流而上的长途旅行。寻找当代生态诗歌的思想与艺术的源头，其意义定当非凡。

在西方，这条悠悠长河的起源可追溯到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于公元前三世纪创作的《田园小诗》(Idyll)。诗中描写的西西里牧羊人平静安详、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与彼时希腊大规模城镇化所带来的城乡隔离的现实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使得田园诗歌从此具有了以埋首于美好过往的逃避式举动来影射乃至批判现实的功能。忒俄克里托斯之后出现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确立了田园诗歌作为独立的诗歌类型的文学地位。其《牧歌》(Eclogues)的创作伴随着不断向农村推进的罗马文明进程，因此诗中有对彼时意大利农村正遭受的种种社会动荡的暗指，也有担心丧失家园的人们对阿卡迪

1 “The ‘Anthropocene’”一词最初由美国海洋学家尤金·斯托曼(Eugene F. Stoermer)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造，后在斯托曼与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于2000年合作发表的论文《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中首次出现并从此流传。

亚的向往。而当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英国文艺复兴全盛期以首部长诗《牧人月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第一次唱响英国式的田园牧歌，其背后不仅有维吉尔等古典诗人的直接影响，更有英国在从封建社会向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必然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的间接参与。

待到英国率先于欧洲诸国开展工业革命，给十八世纪末的英国乡村带去更大的现实威胁，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之时，以自然为主角、歌颂自然生命、赞美崇高自然的自然诗歌便应运而生。传统田园诗歌以牧人或乡村生活为重心，以城乡对立、新旧对比为或隐或现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被忽视，直到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自然才被推至前景。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牧人和农民在富有崇高美的自然山水间活动，在劳动中与自然达成和谐，即使生活艰辛也始终保有纯真的心灵。他的诗歌没有脱离乡村生活的现实，但重点在于表现大自然对于纯洁人格的塑造，构成了田园诗歌与自然诗歌的交汇与融合。在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就此开启英国自然诗歌之先河的同时，田园诗歌日渐衰微：英国田园诗歌的兴起几乎与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的形成同步，诗中一直以来普遍存在对于乡村生活不同程度的理想化处理，这使得人们对它的质疑与挑战几乎从未中断。华兹华斯是道绝对的分水岭；他既创造了田园诗歌的罕见成就，又将其带入垂死之路。因此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和约翰·布尔（John Bull）提出，华兹华斯之后的田园诗歌史不过是“它缓慢死去的历史”（Barrell and Bull：429）。

正如传统田园诗歌因不断加剧的农业工业化和逐渐减小的城乡差别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自然诗歌也终究会因自然自身难以挽回的改变以及人类对其认知的根本性转变而经受脱胎换骨之痛。西方世界在承受着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震荡与精神浩劫的同时，也在战后恢复经济的加倍努力中给环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影响。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第一次将西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暴露于公众视线之内，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环境运动，形成了生态诗歌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生态诗歌因其清醒的生态危机意识和明确的生态责任感而有别于自然诗歌。更为重要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生态诗歌在“人类世”的客观事实与生态批评理论的共同影响下，表

现出颠覆“自然”概念、否定独立于人类活动影响的纯粹自然的趋势，实为对自然诗歌传统的突破。当然，生态诗歌与自然诗歌之间绝非泾渭分明。一些学者在华兹华斯的泛神论与作为现代西方环境主义理论基础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之间找到了明显的思想联系。一些当代诗人如特德·休斯（Ted Hughes）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分别表现出自然诗歌和生态诗歌的典型特征，更说明两者间具有可延续性。

基于田园诗歌、自然诗歌和生态诗歌各自有比较明确的生发的历史契机及文学史意义上的阶段性特征这一事实，本书将它们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据此划分出三个对应的部分，是谓三编。但正如前所言，历史阶段之间存在交叉关系，不同诗歌类型之间也存在相互重叠和融合的可能性。大卫·费尔拉（David Fairer）挖掘出古典农事诗对于自然生态的理解与尊重；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以“田园”概念为主线，串连起实际涵盖田园、自然和生态诗歌三个类型、跨越数百年的诗歌作品。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探究文学传承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借鉴，其中吉福德的田园理论更是可以成为我们寻找规律的有效工具。作为英国著名诗评家和第一代生态批评学者，吉福德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绿色之声：解读当代自然诗歌》（*Green Voice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Nature Poetry*）中把目光集中于26位英国及爱尔兰当代自然诗人及其作品，根据诗歌所反映的自然面貌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把它们分别归为田园诗、反田园诗或后田园诗，其中“后田园”概念为吉福德首创¹。田园—反田园—后田园的思路后被吉福德进一步发展成一个生态批评理论体系，促成了《田园》（*Pastoral*）的问世。与前一部著作相比，《田园》涉及的作品数量更多，时间跨度更大，体裁和题材也更加丰富。在从十六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四百多年间以乡村为背景的作品中，吉福德看到了传统田园必不可少的隐退和回归主题；与此同时，他把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后期的诸多作家都归入反田园的行列，而被他视为后田园的作家队伍则从十八世纪后期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纪。

吉福德把田园、反田园和后田园视为田园文学的三种类型，认为一些诗人

¹ 吉福德在发表于1994年的论文《泥土众神：特德·休斯与后田园》（“Gods of Mud: Ted Hughes and the Post-Pastoral”）中首次使用“后田园”这一表述。

如华兹华斯、休斯和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不同的创作阶段能写出三种不同类型的诗歌，甚至同一首诗中都有可能包含三种元素。他特别关注不同类型的田园作品之间的交叉，或者某一类型的田园作品中暗含的来自其他类型的反作用力，并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在他眼中，田园文学传统既有规律可循，又不囿于规律。吉福德对田园文学三大类型的形成原因、表现方式及其交叠往复的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与我们对于田园诗歌、自然诗歌与生态诗歌之间关系的认识有诸多契合点。尤其是后田园概念，虽然存在因定义过于宽泛而导致的概念模糊问题，但呼应了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一种“成熟的环境美学”的期待（Buell, 1995: 32），即对“一种既歌颂自然又敢于承担起对自然应负的责任的真诚话语”的期待（Gifford, 1999: 148），表现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自然与文化的隔阂的思想境界，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自然诗歌与生态诗歌中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本书所涉及的多个自然诗人和生态诗人实际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后田园视野。

英国田园诗歌、自然诗歌和生态诗歌的发生及演变固然受到文学传统的内在机制的作用，也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其外部驱动力，但其实都离不开一个同时存在于社会、文化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根本性问题，即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根植于欧洲思想文化中的时间/历史概念，“现代性”有着语言学、哲学和神学等领域的不同缘起¹，但它一贯强调现时性和新颖性，这使得它具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与过去决裂的潜在野心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进步的新世界的信心。这个被称作“现代性”的宏愿并非一蹴而就，它孕育于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它生长的土壤，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破土而出的动力，其中后者的作用尤其关键。学界普遍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性始

1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认为至少在语言学范畴内，现代性起源于中世纪这一假说是成立的，而对于现代性至关重要的“进步”概念则出自十二世纪法国作家、文法家兼哲学家沙特尔的贝尔纳（Bernard de Chartres）。参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第18-20页。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则特别强调十四世纪基督教内部的唯名论革命对现代性或现代意识形成的影响：“现代性的产生源于摆脱唯名论革命所引发的危机的一系列努力。”参见《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23页。

于现代科学的萌芽期，因为只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与科学所信奉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相结合，才会产生完整的现代性和有望逐渐走向成熟的现代社会。对于刚刚走出中世纪、渴望摆脱非理性的蒙昧状态的人们而言，现代科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掌控和拥有自然”，这实际构成了吉莱斯皮眼中现代性的首要目标（吉莱斯皮：47）。可见，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欲和征服行为相联系。汪民安将之描述为“理性主体”对自然的除魔（汪民安：4）。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现代性理解为对秩序的痴迷，以及对消除一切矛盾性的幻想：“典型的现代实践[……]乃是为根除矛盾性而作的努力，是一种为精确界定一并为压制和消灭不能或不会被精确定义的一切而作的努力”（鲍曼，2019：12-13）。不难想见，自然会被首先纳入这个由人类主导的秩序化行动中，成为“某种可以征服、可以奴役、可以再造以再适应于人类需要的东西”（12）。毋庸置疑，现代科学以征服大自然为己任，就是为了“使之服从于人类需要这一压倒性抱负”（60）。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及其科学精神绝不会止步于征服自然，它所遵循的理性权威会借合理秩序之由，把所有“败坏秩序、和谐、设计因而拒绝目的和意义者”视同与大自然一样的他者或异类，予以改造、清理或消灭（61）。

欧洲或西方现代社会所进行的这项持续数个世纪的秩序化事业也被称作“现代性规划”或“现代方案”¹。它是首先且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发展规划，也称“现代化”²。虽然以发展逻辑开展的现代化进程的确让社会取得了诸

1 吉莱斯皮认为，以社会的“和平、自由和繁荣”为目标的“现代方案”是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人的构想为基础的。参见《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15页。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将“现代性规划”明确描述为把人类知识的积累“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的事业，认为它直到十八世纪才成为社会的焦点。参见《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20页。

2 卡林内斯库提出，现代化首先是社会—经济规划，包括“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政治现代化”，之后发展出“理智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详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第349-350页。

多进步，但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现代化¹所造成的环境或生态代价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或精神层面的代价，其后果往往严重滞后且不可逆转。诚然，人类对环境的干预与破坏绝不只是个现代的问题，但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无疑在更大的规模上加深了环境恶化的程度。因此，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制造灾难、给自然和人类自身带去“现代化阵痛”的过程。环境哲学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指出，当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从根本上都源自“理性主义文化以及作为这个文化的标志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因此生态危机也可被视为“理性的文化的危机”（Plumwood: 4-5）。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更是明确地把环境危机斥为“进步的阴暗面”（Beck: 2），指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内部，又因其剥夺了“机构的自治性”而与资本主义相抵触，因而它又是“工业社会自身的危机”（140, 143）。学者们在回望中认识到：西方社会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下，在通过资本化和工业化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同时，表现出与自然为敌的征服者的姿态，这为西方世界的将来埋下了祸根。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大致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现代化，这是一个企图依靠技术革命和政治霸权来摆脱本土自然条件的局限，却给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自然环境制造出越来越不堪承受的重压的过程。诗人们对现代化施加于时代、社会及自身的压力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应：斯宾塞全情投入；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保持审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T. S. 艾略特（T. S. Eliot）和希尼从上帝、自然或乡村传统中寻求对抗现代性的精神力量；休斯等众多当代诗人将诗歌创作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更加积极亦更具合作性的姿态，为遏制现代化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为保护生态共同体而持续努力。

本书考察的英国诗歌文本产生于十六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的四百多年间，以发表于1579年的斯宾塞的《牧人月历》和出版于2011年的《倾斜的地面：激进派风景诗选》（*The Ground Aslant: An Anthology of Radical Landscape Poetry*）为起止标志，在时间设定上突出文学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尤其突出英国诗歌演进与英国现代化进程相伴随行的事实。劳伦斯·卡洪（Lawrence

1 本书讨论的现代化主要是西方学术界定义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不同。

Cahoone) 综合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把欧洲现代性分为三个阶段：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为婴幼期和成长期，这是一个人们逐渐摆脱对古代人的崇拜和依赖，并逐渐获得更多自信的过程；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早期是现代性展示出“不可遏止的进步”、快速走向成熟的时期；而两次世界大战则将现代性绘制的宏伟蓝图扯碎，宣告了现代性规划的终结和一个新的现代性，又称“后现代性”的到来。英国的现代性或现代化进程表现为大致相同的三个阶段，与英国田园诗歌在十六世纪晚期的生成，自然诗歌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出现，以及生态诗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兴起相互呼应。雷蒙·罗杰斯 (Raymond A. Rogers) 也认为，英国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危险的认识反映在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上的三种文学形式当中：第一是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的莎士比亚悲剧，第二是紧随“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广泛开展”而产生的浪漫主义诗歌，第三是在“向世界经济全球化迈进的当代运动”中生成的“极端环境主义批评” (Rogers: 99)。罗杰斯对于社会现代性的阶段性发展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观察与本书的观点不谋而合，只不过本书完全聚焦于诗歌，因为诚如乔纳森·贝特 (Jonathan Bate) 所言，只有诗歌能以富有音乐性的节律，成为“自然自身节奏的回应，大地之歌的回响” (Bate, 2000: 76)。诗歌与自然的这种天然联系使诗歌成为现代人追忆或追求他们日渐失去的自然的最佳渠道，也使诗歌自身成为一个与自然相通的栖居之所。

有鉴于英国诗歌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阶段性特征，本书在三编之下共分十章，每一编围绕“田园诗歌”“自然诗歌”“生态诗歌”中的核心问题安排内容，尽可能从不同方面呈现该阶段诗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为了避免文学史式的梳理有可能造成的问题意识模糊及深度不够的弊病，本书每章聚焦一个诗人或诗人群体，抑或某一题材的诗歌；在生态批评视角的主导下，同时遵从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认知，对诗歌文本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本书力图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清晰呈现英国田园诗歌、自然诗歌和生态诗歌三个文学类型之间的发展脉络和思想联系；同时利用纵向的历史视角，展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及转型完成之后数百年间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在诗歌中的投射。

本书第一编的两章分别从国家政治层面以及社会和个人层面观察诗歌中的

田园与农事之争及其现实意义。第一章以斯宾塞诗歌中的农事元素为关注点。诗人在史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赞扬以农事为代表的一切艰苦卓绝、持久不懈的劳动，传达了一种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田园诗歌所蕴含的田园旨趣大相径庭的“农事精神”。斯宾塞对时间的认知，尤其是他所接受的结合新教工作伦理的基督教末世意识，使他充分肯定劳作所具有的自我救赎的道德意义。斯宾塞希望以其诗歌来促使决策者重视农业生产中蕴藏的时代先机，完成帝国振兴的大业，其思想背后有他作为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本章最终揭示，斯宾塞于作品内外力主推进的爱尔兰殖民地的土地管理改革计划，在如其所愿地帮助英国获取帝国崛起于现代世界所需的资源和财富的同时，也对爱尔兰的社会和环境造成了不容历史抹杀的灾难性影响。第二章关注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马维尔在英国内战期间创作的多首貌似与时政无关、大有逃避现实之嫌的田园诗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割草人组诗”。有学者指出，马维尔利用割草人这一非传统田园形象，实现了农事诗歌与田园牧歌的糅合，不仅表达了对劳动的尊重，更有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怀。本章通过对割草人组诗的分析指出，实际上割草人的形象反映出英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之间的现实关系，蕴含着诗人对农业改革的审慎态度，更揭示出诗人以良心为准绳，以消解矛盾、敬畏自然为基本内容的农事理想。第一编的两章均涉及农事诗或诗歌中的农事元素。相较于同属田园诗歌传统的田园牧歌而言，农事诗与自然的现状及人类社会的现实都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能更好地反映英国在十六、十七世纪第一次农业改革期间所进行的重大政治和经济活动对于环境和社会的深刻影响。此外，田园牧歌的理想主义和农事诗歌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纠缠和妥协在斯宾塞和马维尔的诗歌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也持续出现在诸多关注乡村社会与环境的后代诗人的作品中。再者，两位诗人对于现代性的不同反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早期现代性以农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形式给土地和自然戴上了枷锁，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深度疏离，“征服自然”就此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斯宾塞的诗歌创作和政治经济活动便是这一话语的代表，马维尔的态度则与之形成一定的对比，或可用“慎用自然”予以概括。

第二编进入自然诗歌阶段，依照诗人出现的先后顺序，串联起生态批评视域下自然诗歌最为重要的若干话题：自然与身体、自然与宗教、自然与城市、

自然与自我。第三章从身体与环境的关系角度重读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长诗《麦布女王》（*Queen Mab*），提出诗歌虽带有鲜明的空想色彩，但其实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因为它谱写了雪莱“改造世界”的逻辑。本章发现，雪莱的素食主张直接反映在该长诗关于田园传统的书写变异中，其背后蕴含着浪漫主义普遍的“身体意识”。在身体意识下，雪莱刻画了一个充满大量毒素与环境指涉的旧世界，并设想通过素食主义，使旧世界成为万物和谐的新世界；田园情结在此逻辑中转换为生态理想，生成浪漫主义的自然诗歌语境。第四章的焦点诗人霍普金斯以宗教和自然为其诗歌创作中最为重要且并行不悖的两大题材。在后达尔文时代，诗人通过融合天主教徒和博物学者的双重视野，运用其自创的“内质”和“内力”的概念巧妙化解了当时自然观中神性与物质性的冲突，同时创造性地变通诗歌韵律形式，使其诗歌始终贯穿着宗教热情及对自然的赞美与崇拜。霍普金斯在风景书写中展现了人与自然环境在神性光照之下的交融，由此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较早具备“环境无意识”的自然诗人。第五章聚焦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The Waste Land*），将其视为模仿十八世纪城镇牧歌而作的戏仿田园诗，认为诗人的目的在于以田园的丰美反讽城市环境的脏污，批判工业主义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异化，揭示潜在的城市发展危机。本章还指出，艾略特从古典主义田园诗中找到了与东方宗教和人类学神话相一致的顺应自然的原始智慧，并试图将顺应自然的田园主义生活方式作为挽救现代城市荒原的途径。第六章分析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巴兹尔·邦廷（Basil Bunting）的自传体长诗《勃力格低地》（*Briggflatts*），探查诗歌中描绘的自然与诗人自我身份探寻之间的关系。诗人在诗歌中展现了自然的物质力量，凸显了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上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挑战，表现出明确的环境意识。本章还进一步指出，《勃力格低地》中的自然既参与了现代主义话语的建构，又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自然的双重属性为解读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开辟了新的思路。

这一编的四章显示，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近两百年时间里，随着圈地运动在英国乡村的全面展开直至完成，以及工业革命的持续深入，环境问题日益突显，不仅激发出人们愈加迫切的自然关怀和愈加深厚的自然情感，还渐渐使人们生发出越来越清晰的环境意识。田园传统的影响在这一时期

的自然诗歌中持续可见，表现出与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相适应的思想灵活性和艺术韧性。如若从自然诗歌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加以观察，我们发现在自然诗歌涉及的众多话题中潜藏着一个共同的深层主题，即“回归自然”。诗人们以此作为对抗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只不过回归的途径各有不同。雪莱希望消除现有的社会罪恶，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健康、和谐的新世界；艾略特希望恢复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通过对过去的回望，抗议现代化对乡村的入侵和对城市的荼毒；霍普金斯怀有华兹华斯式的自然虔诚，又因在其中注入了科学的力量和上帝的启示，其自然体验成为极富浪漫主义精神同时也极具时代特色的回归之路。本编前三位十九世纪诗人代表着自然诗歌“回归自然”的三种典型方式，唯有二十世纪的邦廷因其对纯粹自然的放弃，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然诗歌的理想主义模式，表现出自然诗歌向生态诗歌转变的可能性。

第三编开启了当代生态诗歌的篇章。这一阶段的诗歌最显著的改变便是兼顾城市与乡村，强调人类活动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以有关环境或生态的思考取代了自然诗歌对于乡村或田园的青睐，甚至不惜撼动自然诗歌最为珍视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自然”概念¹。第七章以希尼的所谓“家务农事诗”为研究文本。希尼有多首描写女性开展家务劳动的诗歌，如《莫斯浜：阳光》（“Mossbawn: Sunlight”）和《出空》（“Clearances”），都深受读者欢迎。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希尼的诗歌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本章指出，正是对家务劳动的偏见使得女性主义批评者无法发现希尼家务农事诗中女性形象的现实和社会意义。希尼实际上通过借鉴农事诗传统，展现出女性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自然、顺应自然的能力，以及面对恶劣环境和艰苦劳动时的坚韧品格，逐渐把家务劳动推向与维塔斯贞女（Vestal Virgins）的劳动相同的重要地位。希尼笔下女性

1 此处的“自然”有两个释义：一是作为“个体的植物、非人类动物和元素”的集合体（参见 Lawrence Coupe, ed,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p. 3）；二是作为“给予世界或人类或两者以指引的固有力量”（参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 219）。在第二个释义中，自然既可以外在于人类，也可以被内化，但其“指引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与人类或人性相对立、与社会相对抗的独立力量，这正是浪漫主义思想所赋予的力量。

家务劳动者身上闪动的人性光辉，既是希尼在爱尔兰大动乱期间负重前行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也是一盏指引北爱尔兰人民重建家园的明灯，反映出诗人的责任与担当。第八章讨论的诗人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以地方诗歌成为当代英国诗坛的代表性人物。对于其诗歌中的地方形态到底是静止停滞的还是动态联通的，学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本章认为阿米蒂奇自身的地方意识经历着变化，且这种开放性的地方意识有别于其他乡民。诗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促使他体察到家乡马斯登兼具地方性和全球性：一方面它是英格兰北方的缩影，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工业发展对自然的慢暴力与自然自我修复的历程；另一方面，马斯登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的构成部分，其环境问题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环境困境，揭示出地方与他方具有无法分割的生态连接性的事实。第九章以当下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研究者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为议题。当代英国诗人创作了大量有关全球变暖、冰川消融和物种灭绝的诗歌作品，对气候变化作出回应，展现出自觉的气候伦理意识。本章在梳理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的基础上界定气候伦理的含义，重点检视当代英国诗人德雷克·马洪（Derek Mahon）的气候变化组诗《向盖亚致敬》（*Homage to Gaia*）中的气候伦理意识。马洪在组诗中借由“盖亚假说”探讨了气候变化所统摄的地方与全球、环境正义、绿色科技等议题。诗人通过描绘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和社会影响，号召读者重新审视人与自然间失衡的关系，建立和谐的气候伦理。第十章在对“风景”概念的审视中发现，随着人类世的不断延续，风景的内涵已从侧重自然的“大地”向“人为干涉”和“城市文明”偏移，由此风景中传统的自然审美被剥离，注入了“反风景性”。当代英国激进派风景诗¹运用反传统的语言形式描绘自然与文明、荒野与都市共存的现代风景，展示了风景之内包含反风景的一面，已成为后现代的杂糅。本章探析激进派风景诗如何利用文本空间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自然与科技文明的交锋和融合切入，重构“自然”和“风景”概念，显示出深刻的生态意蕴。

1 “激进派风景诗”这一名称由哈里特·塔洛（Harriet Tarlo）于1997年在英国斯旺西召开的“文学与自然环境”会议中首次提出，参见 Harriet Tarlo, “A Preview of *The Ground Aslant: Radical Landscape Poetry*”, *English*. 2009(58), p. 193。

第三编表现出当代英国诗人破解二元对立思维、重建人与自然连接的后田园视野，展现出诗人们在生态危机与社会道德危机共存的现实面前，以倡导环境正义和生态伦理为己任的集体面貌，也在当代诗人与前辈诗人的承继关系中展现出人们不曾改变的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渴望和追求。当代诗人理解人类对于自然本能的、补偿式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人们心中的那个自然在现实中已然崩塌。因此，他们不再将抵御现代性的希望寄托于“回归自然”这样一个并无多少现实可能性的想法或举动之中，而是凭借他们对于地方与全球之间辩证关系的认知，一方面像希尼那样，通过立足于地方来抗衡动荡的国际政治格局，以此保护区域环境和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像阿米蒂奇、马洪以及激进派风景诗人那样，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连接地方与他方，为实现拯救地球的终极目标而努力。

第一编 |

自然诗歌的前身——田园诗歌 |

作为西方文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孕育出几乎所有现代文学文类的雏形，包括田园诗。学界普遍认为，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创作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田园小诗》中的部分诗歌表现纯朴的乡村生活，已初步具备后人所谓的“田园诗歌”(pastoral)的一些基本特征¹：比如以对唱或独白的形式表达青年男女的爱恋、老牧羊人的劝诫以及对亡友的哀思，并引神话人物入诗，让乡间成为人神共居之处——这些都成为后世眼中传统田园诗的必要元素。不过忒俄克里托斯笔下的乡村生活有喜有悲，过于写实；人物类型也过于复杂，不仅有牧羊人，还有农民、奴隶、渔民、牧牛人、家庭主妇等，缺乏标识性，且个别人物的语言过于露骨或流于猥琐，无法形成一致的、可供效仿的传统或典范。真正将田园诗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一种特定文类的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维吉尔的《牧歌》大致创作于公元前 42 年到 38 年之间，共收录十首诗歌，明显受到《田园小诗》的直接影响，继承了忒俄克里托斯的乡村生活题材、牧人独白或对唱的诗歌形式以及情感误置等写作手法。《牧歌》其五还沿用了《田园小诗》第一首中“达芙尼之死”这一题材，描写了理想牧羊人达芙尼死后，山川河流及众神一起哀悼的场面。维吉尔在模仿忒俄克里托斯的同时，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他对阿卡迪亚的理想化描写、对牧人生活的浪漫化表现尤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忒俄克里托斯笔下的田园风景与真实的西西里岛和科斯岛尚有一定距离，那么维吉尔塑造的田园世界则在整体上与彼时罗马的现实相距更远。维吉尔诗中的乡村有三处：一处是诗人的故乡曼图安，一处是忒俄克里托斯笔下的西西里岛，一处则是更为渺远的阿卡迪亚。维吉尔对曼图安和西西里的描写尚比较接近社会现实，因都市政治斗争的影响而导致的乡村骚乱频现其间，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乡村平民阶层对政治变革的不满。相比之下，阿卡迪亚作为希腊神话中原始人的居住地被诗人改造成与世隔绝的、理想化的牧羊人居所。由于远离都市和战争，那里始终保持着原始的景象，四季如春，美丽富饶，生活安逸，更有众神的护佑，是消失的“黄金时代”的再现。阿卡迪亚就此成为和谐、富足与欢乐的象征。维吉尔笔下的牧人形象大体相似，拥

1 尽管《田园小诗》一般被认定为忒俄克里托斯的作品，但其实学界对其中部分诗歌的作者身份依然存疑。

有相同的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符合人们对“黄金时代”的想象，同样具有象征性，表达了诗人对遵循自然与天性的人类原始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现实中远离自然的城市生活的不满。这种田园生活中的牧人没有个体价值，由其构成的乡村和谐社会成为一种供城市人怀念的旧生活的代表。不难看出，先人们对阿卡迪亚的向往与后世浪漫主义诗人们对自然山川的亲近之情之间有着长久且深远的联系。

维吉尔的《牧歌》正式确立了古典田园诗歌的典范；随之确定的是田园诗歌的两大思想倾向或思想传统，即空间上由城市向乡村的欣然退隐，以及时间上从现在向过去的深情回望。在《牧歌》之后，维吉尔又以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为模仿对象，于公元前37年到30年间创作了《农事诗》（*Georgics*）。诗集同样描写乡村风光和生活，却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牧歌》的不同。《农事诗》由四卷组成，每卷涉及一项农业技术，包括谷物种植、葡萄和橄榄种植、畜牧及养蜂，内有大量有关劳动细节的描写，具有指导农牧业生产的实际意义。此外，诗歌还以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气象灾害、瘟疫等天灾人祸，记录了它们对乡村和农牧业生产的恶劣影响。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古典时期的农事诗与田园牧歌之间清晰的边界。农事诗对于大自然的无常性有着尤为清醒的认识，表现出一种远比牧歌务实，甚至比浪漫主义诗歌更加贴近生态现实的诚实态度¹。当然，农事诗与牧歌的差别取决于两者的创作目的。《农事诗》将道德教诲与农业生产指导相结合，为屋大维鼓励发展农业的现实政治服务；《牧歌》则在隐晦表达对现实不满的同时，为有望让“黄金时代”重现的恩主歌功颂德。不过，农事诗与牧歌一样，也通过赞美乡村的美丽祥和将乡村生活理想化。这一倾向使得二者在十七世纪后期相互渗透融合，加速了英国田园诗歌的本土化进程。

1 大卫·费尔拉（David Fairer）通过对十八世纪英国农事诗的研究提出：延自维吉尔的农事诗传统承认时间之流作用于自然之上而产生的种种无常现象，表现出在日常劳作中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合作的态度，与将自然视为一个超验的精神存在的浪漫主义诗歌相比，更忠实于自然本身，应被称为“生态—农事诗”。相关讨论参见 David Fairer, “‘Where Fuming Trees Refresh the Thirsty Air’: The World of Eco-Georgic”。

由于《牧歌》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随着维吉尔声誉日盛而在欧洲流行，远远早于《农事诗》，人们对古典田园诗歌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仅限于田园牧歌。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后期，田园诗歌经由拉丁文诗人曼图安 (Mantuan) 和意大利诗人雅各布·桑纳扎罗 (Jacopo Sannazaro) 的影响进入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田园诗歌以古典田园诗歌为范本，模仿意大利和法国的诗歌技巧，融入英国化的思考和本土元素——属于英国的规范的田园诗歌形式由此形成并占据了诗歌主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斯宾塞的《牧人月历》。作为维吉尔以来所有用欧洲语言写就的田园诗歌中最为完善的一部，《牧人月历》不仅继承了古典田园诗歌的诸多艺术手法，还具有显著的本土化风格，在语言风格、情感趋向以及道德和宗教观念上都与维吉尔的田园牧歌有所区别。斯宾塞把牧歌的背景从遥远的阿卡迪亚迁至英国的肯特郡，把山雀、斑鸠、画眉、夜莺等英国常见的鸟类，以及橡树、三色堇等典型的英国乡村花木，还有沼泽、湿地等自然风貌统统纳入他的英式田园风景中，更邀来英国民间传说中的林间精灵，与潘神和美惠三女神一同穿梭其间。更为重要的是，斯宾塞让自然在四季的更迭中更加贴近常态，让曾经只愿流连于春色之中的时间自由流淌起来，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黄金时代”幻象对田园诗歌的垄断。但其实无论是对于斯宾塞的《牧人月历》还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其他田园诗歌而言，田园风景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点缀，甚至连牧人这个田园诗歌名义上的主角也不过是理想化的面具或高雅的伪装。《牧人月历》实际以宗教批判和政治讽喻为主旨，属于曼图安式的宗教寓言诗或道德教谕诗，是受赞助的文人献给恩主的献媚或政治宣传之作。其他如克里斯托弗·马娄 (Christopher Marlowe) 的田园爱情诗则是廷臣或贵族的自娱自乐之作，沿袭了桑纳扎罗式的田园退隐诗和爱情诗的路线。

十六世纪后期由斯宾塞引领的英国田园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与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对于自然和乡村的由衷喜爱和主动拥抱。这个趋势在十七世纪得以延续和发展，这一时期除了田园寓意诗和田园退隐诗继续流行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本地化的子类型，如田园风景诗和乡村庄园诗。前者以迈克尔·德雷顿 (Michael Drayton) 描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理风貌和乡村美景的长诗《多福之邦》

(*Poly-Olbion*) 和约翰·德纳姆 (John Denham) 描写泰晤士溪谷风景的《库珀山》(*Cooper's Hill*) 最为成功，后者以本·琼森 (Ben Jonson) 的《致潘舍斯特》("To Penshurst")、托马斯·卡鲁 (Thomas Carew) 的《致萨克斯海姆》("To Saxham") 以及马维尔的《阿普敦宅邸》("Upon Appleton House") 最为典型。这一时期的田园风景诗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表现大自然的丰腴，虽然仍旧拘囿于理想化的田园世界，还有大量程式化的表述，但它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自然之上，为十八世纪中期詹姆斯·汤姆逊 (James Thomson) 的风景诗以及浪漫主义时期自然诗歌的闪耀登场搭建起舞台。乡村庄园诗更是田园诗歌英国本土化的结晶，其在十七世纪早期的出现及此后约半个世纪的流行固然与诗人受恩主赞助的传统相关，但更多是贵族们大量兴建乡村庄园的现实所致。因此当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诞生的诗歌类型在十七世纪中后期逐渐衰微，其背后的原因除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的乡村庄园及其典型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由此，诗人为取悦恩主而采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美化庄园以及围绕庄园所形成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做法便失去了市场。乡村庄园诗虽然同传统田园诗歌一样，对乡村的自然与社会都进行了明显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处理，有显而易见的政治保守倾向，但同时也反映出诗人们敬畏自然、尊重传统的信念。如琼森在《致潘舍斯特》中歌颂庄园主顺应土地使用传统，不改变当地原始风貌，不胡乱引进外来的植物和奇异的建筑风格；马维尔的《阿普敦宅邸》同样借排斥异国花卉和建筑来突出庄园主对本地自然环境的尊重，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及乡村社会和睦安宁美德的维护。诗人们敏感地察觉到乡村正面临现实威胁，希望借助传统的力量与之对抗，与后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倾向似乎别无一致，但其实两者所倚仗的传统大不相同。此另当别论。

英国田园诗歌传统在十八世纪发生了若干重大转变。一是汤姆逊的著名长诗《四季》(*The Season*) 的出现，二是农事诗的兴起，三是感伤主义与田园的结合。与传统田园诗歌以理想田园来掩盖对现实的不满大为不同，1730 年出版的《四季》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存在于当下的、英国版的“黄金时代”，反映出诗人对现实的极大信心。而事实上，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国内工商业活动及海外殖民活动的联合推动下日益强大，其自然面貌已发生极大的改变，反映在《四季》中便是由耕地和公园组成的现代化的田园景观与残存的未被人类驯化的野

性自然交替出现；后者因其“崇高美”而成为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的灵感来源。至于英国十八世纪农事诗的兴起，无疑直接得益于维吉尔的《牧歌》和《农事诗》于1697年翻译并出版这一事实。安东尼·洛（Anthony Low）认为农事诗在英国十六、十七世纪农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持续“缺席”，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文学界普遍怀有鄙视体力劳动的心态，因而“藐视，或更常见的情况是，彻底忽视农业劳动者”（Low：14）。但亦有例外。斯宾塞和马维尔都极为关注农业生产，其史诗或田园诗都表现出一定的农事维度。不同的是，斯宾塞对农事的重视有着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动因。他所主张的土地管理改革计划不仅沦为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手段，还给爱尔兰的自然环境带去毁灭性的破坏。与斯宾塞相比，马维尔看待自然的目光有着更多的敬畏，对乡村传统也有着更多的尊重，因而他对农业改革抱有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展现出早期英国田园诗歌以及更加广泛地存在于各种文学类型中的田园旨趣因农事元素乃至农事精神的注入而发生的深刻变化。

洛提出，农事与田园相同，既是一种文学类型，也是一种思想模式，或许后一种说法更准确。他虽然认同学界有关英国农事诗起点的共识，即以维吉尔的诗歌为范本的、严格意义上的农事诗始于十八世纪早期，但他又认为实际上从斯宾塞开始，“农事模式与精神，以及农事主题和意象已正式进入英国诗歌”（Low：117）。洛所说的“农事模式”（the georgic mode）是有关农事诗歌中态度与思想的一种更加宽泛的表达和存在，它归根结底是对劳动者和劳动价值的肯定。英国诗歌界用了一个多世纪才走完从农事模式到农事诗歌的艰难旅程，让社会对于农业劳动的重视得到诗人及其他知识阶层的响应，让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的形象经由诗歌的加工与传播被接纳为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十八世纪英国农事诗歌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田园与反田园并行。十八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典型农事诗，如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ips）的《苹果酒》（*Cyder*），克里斯托弗·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的《蛇麻花园》（*The Hop Garden*），约翰·戴尔（John Dyer）的《羊毛》（*The Fleece*），以及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inger）的《甘蔗》（*The Suger-Cane*）等除了传递实用的农业技术以外，依然在以田园诗的手法“将勤劳而非悠闲的乡村生活理想化”

(Potts: 3)。这一时期农事诗的乐观面貌既产生于中产阶级诗人与农事劳作的审美距离，也取决于他们对包括农业开发在内的国家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肯定与支持。而对于那些乡村劳动者来说，劳动过程并无浪漫可言，田园诗歌中轻松惬意的劳作和快乐无忧的劳动者不过是赤裸裸的谎言；揭穿这一谎言的便是反田园的农事诗，如打谷工人斯蒂芬·达克 (Stephen Duck) 创作的《打谷者的劳作》(*The Thresher's Labour*) 以及洗衣女工玛丽·科利尔 (Mary Collier) 的诗集《妇女的劳作：致斯蒂芬·达克》(*The Women's Labour: An Epistle to Mr. Stephen Duck*)。

达克等的农事诗展露了乡村劳动的真实面目，也被归为反田园诗。其实广义的“反田园”，即任何反映乡村现实、打破田园幻象的描述，一直都散见于田园诗歌当中，就连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小诗》和维吉尔的《牧歌》也不乏反田园元素。到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圈地运动更大规模并更大程度地持续推进，农业资本主义迅速改变着乡村的自然面貌，社会矛盾亦愈演愈烈。一批有着实际乡村生活经历的中产阶级诗人以反田园的方式，彻底撕下田园诗歌为乡村蒙上的美丽面纱，代表性作品包括奥利弗·戈德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 的《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查尔斯·丘吉尔 (Charles Churchill) 的《饥荒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Famine*)，约翰·克雷布 (John Crabbe) 的《村庄》(*The Village*) 等。自然在这些诗歌中频繁现身，却美好不再。戈德斯密斯诗中的自然原本和谐，却被圈地运动毁坏；克雷布眼中的自然对辛苦劳作的人们从不友善；丘吉尔目睹的自然甚至本就令人生厌。

当反田园诗歌把自然视同田园幻象予以否定和排斥，感伤主义悄然潜入田园诗歌，让汤姆逊为荒野带给他的“哲学式的忧郁的力量”痴迷 (Thomson, 1906: 121)，也让威廉·柯珀 (William Cowper) 为自然界弱小生灵的不幸遭遇而动容。柯珀赋予自然万物以灵性，展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纽带，发出了浪漫主义的先声，其语言、视角和情感对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事实上，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英国田园诗歌所经历的变化与这一时期两个足以改变人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现实密不可分：一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二是海外殖民扩张的开展。在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看

来，农业资本主义制度“以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成功地改变了它的环境，把人和自然都变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目的的工具”（威廉斯：119）。威廉斯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彼时农业英格兰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他所描述的人与自然的工具化或物化现象正是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标榜进步和发展目的的、更为普遍的现代性问题。显然，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既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又受限于各自的身份、阶层和经历，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立场和情感认同。因此我们看到，在十八世纪早期及之前的诗歌中，农业改革所带来的可见的效率和财富使得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田园诗人们为之欢欣鼓舞。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对生产和投资的热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肥沃的草地也乐于喂养
他那产乳的小母牛和战功赫赫的骏马；
树林在茁壮成长，既非出于骄傲，也非为了炫耀，
而是为了将来修屋建船：
要让他的种植园从一片草丘延续到另一片草丘，
先是荫蔽一处乡间，然后兴建一个城镇。¹

引文中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诗人强加于自然的理性和工具性目的。蒲柏对待农业资本主义的态度与马维尔有着明显的不同。马维尔诗歌中不断浮现的入世与退隐、秩序与无常之间的张力反映出诗人对于现实犹疑的接受，其审慎的态度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尤显难能可贵，是以辟专章进行研究。

而当马维尔的审慎在约一百年后重现于汤姆逊的长篇田园诗中，以更加富有激情的语言，呈现出对土地改良及对新型乡村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矛盾心态之时，在强势开展的议会圈地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深化的农业资本主义已激发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愈加凸显的价值危机。此后，来自失地的、无所依

¹ 原文出自 Alexander Pope, *Epistle to Burlington*, I. pp. 85-190；译文引自威廉斯，第 83 页。

托的乡村劳工阶层和富有同情心的经济独立阶层的抗议之声便不绝于耳。这其中，被威廉斯称为“浪漫主义的情感结构”，即“自然与工业、诗歌与贸易之间的对立”，首次出现在戈德斯密斯的反田园诗中（威廉斯：113）。在此，乡村工业对自然的侵害，无情的贸易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藐视，亦即对诗歌的放逐，都在田园诗歌不可或缺的对比结构中增添了现代性的成分，而自然与诗歌也凭借着诗人的浪漫主义思想，拥有了“自立自强的力量”，以“抵抗巨浪和天空”¹。

当农业资本主义为英国现代化充当开路先锋之时，英国也几乎在同时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加速其现代化进程，以此实现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斯宾塞对殖民政策的坚定拥护和对帝国事业的热烈期盼是利益获得者的典型姿态，也反映了彼时英国民众对殖民主义普遍持有的接受态度。我们通过对斯宾塞诗歌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到西方现代性的政治阴暗面及其在社会和环境层面造成的恶劣后果。大量史实表明，英国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对本土和殖民地环境均造成了持续的破坏，其程度之深在十八世纪尤为凸显。以森林为例，欧洲在十八世纪的木材进口量不断攀升，其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口在此前一百多年里持续增长，需求量的提升使得欧洲各国森林覆盖率普遍大幅下降，其中尤以资本主义最为发达、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英国为甚，此外海外殖民所需军舰和商船也造成了木材的大量消耗²。可想而知，欧洲因自身森林资源匮乏，势必将资源压力转嫁给他国，从而造成殖民地的森林惨

1 原文出自 Oliver Goldsmith, *The Deserted Village*, I. pp. 429-430；译文引自威廉斯，第113页。

2 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在《地球森林的消失：从史前到全球危机》（*Deforesting the Earth: 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中给出的相关数据是：欧洲人口从1600年的1.05亿升至1750年的1.4亿，而在与此大致相当的时段内，有大约1840万到2460万公顷的森林从欧洲消失。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森林覆盖率在十七世纪末时已低至7.7%，不及法国北部森林覆盖率的一半。上述数据转引自Elizabeth Heckendorn Cook, “Remaking Eighteenth-Century Ecologies: Arboreal Mobility”, p. 160。

遭浩劫¹。但在十八世纪及之前，殖民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被人们普遍忽视，或被视为发展的必要代价。蒲柏把“修屋建船”视为树林生长唯一的合理目的，其实是以自然化手法来美化英帝国的发展大计。

与森林砍伐对环境的显著改变相比，殖民活动还以另一些更隐秘或更具迷惑性的方式重塑着殖民地及其宗主国的地貌和风景。有研究表明，英国十八世纪的风景园林和可耕地一样，都在“改良的风气”的影响下，由沼泽地、荒地和已被砍伐殆尽的林地改造而成，充斥着外来的花草、树木和粮食品种，依靠的正是“殖民和贸易的国际扩张所形成的植物网络”(Cook: 156)。马维尔虽然极其反感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为一己虚荣而疯狂追逐稀有的外来植物品种，但他的厌恶并没有透过植物贸易触及帝国殖民主义本身。植物和木材贸易不过是在欧洲殖民活动的推动下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一小部分，现代化以不可阻挡之势侵入世界各个角落，改变着自然、社会和人心。这或许是人类文明的必经阶段，但至少其中的一些极具攻击性、掠夺性和侵害性的手段并非不可避免。现代化早期的诗人们普遍缺乏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反省，只能留待后世加以弥补。

1 研究表明，十八世纪的国际木材贸易使得一些地区的木材资源被耗尽，比如加勒比海“甘蔗岛”上的森林在十七世纪晚期遭严重砍伐，甚至需要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新英格兰运送薪材。参见 Elizabeth Heckendorn Cook, “Remaking Eighteenth-Century Ecologies: Arboreal Mobility”, p. 160。